

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化建构

——基于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视角

陈金圣 著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Power in Perspectiv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化建构

——基于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视角

陈金圣 著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Power in Perspectiv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化建构：基于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视角/
陈金圣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6

ISBN 978 - 7 - 5161 - 4425 - 1

I. ①大… II. ①陈… III. ①高等学校—学术研究—科研管理—教育制度—研究—中国 IV. ①G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408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卢小生
特约编辑 解书森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3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
插 页 2
字 数 334 千字
定 价 6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

序

陈金圣博士的专著《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化建构》是其主持的广东省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得知书稿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为他的导师，我感到颇为欣慰。经不住他多次恳求，我应允为其作序。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一个十分突出的景象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在中国高等教育界日益成为一项既具有社会广泛共识，同时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又充满思想犹豫、价值冲撞和利益博弈的改革议题。这一现象至少表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它在理论指导层面还存在某些不够清晰之处。从理论上彻底探明这些模糊地带，有助于使这一制度创新进程从幼稚的躁动转变为深思熟虑的行动，由步履蹒跚走向步履坚定。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陈金圣博士选取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宏大议题有机关联的一个局部性命题——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化建构，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为理论工具来进行剖析，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学术尝试。事实上，这一选题和分析视角是我们师生合作的结晶。三年前，他拟以时下热点话题“大学行政化”的生成与解构作为研究选题，可是未得到我的首肯。在我看来，大学行政化是制度化组织活动的产物，而大多数对“去行政化”主题趋之若鹜的选题常常停留在简单化、表面化的现象之下，难以揭示更深层的规律。于是，我提议他更多关注那些容易被时下热点话题所遮蔽，然而却更具建设性的研究命题，比如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化建构，他深以为然并欣然接受。在选题和命题确定之后，他听从我的劝告，潜下心来研读了一批经典著作，从中找到了比较恰当的分析视角和理论工具——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大学组织制度变革问题兼有组织研究属性与制度分析属性，组织新制度主义作为组织研究学派和制度分析学派合流之后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不仅同组织研究领域保持着天然“亲缘”关系，

而且特别适合用来对兼有组织研究属性与制度分析属性的具体实际问题进行有深度的研究。选题的务实、独到和视角的适切、新颖，为这部专著的整体构思奠定了良好开端。时至今日，能够深入、系统地研究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化的学术成果在国内仍然不多，这恰恰说明本书的出版有其自身的价值。

就内容而言，本书以“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化建构”为核心论题和全书主线，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为理论依据和分析工具，在对组织新制度理论予以述评的基础上提出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化建构的组织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并据此展开各部分的论述。在书稿的主体部分，首先，作者沿着中外大学制度史的脉络，简要回顾西方大学发展史，透视了西方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化的历程，在剖析中世纪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化案例、作出“中世纪大学已完成大学学术权力的初始制度化”判断之后，因势利导地概括了学术权力成熟化阶段的西方大学教授治校制度，总结了西方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化成果对后世大学组织运行的启示。其后，书中先以我国民国时期知名大学为例，分析始于北大、续于清华、盛于西南联大的我国近现代大学阶段的学术权力制度化历程；后扼要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现当代大学阶段的学术权力制度演化过程，接着选取六所高校进行“麻雀解剖”，分析并据此刻划行政化制度背景下大学学术权力的运行状态特征。最后，在研究结论部分，作者指出制度环境、组织生态、文化认知等基本制度要素都足以影响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化特征，然后分别从静态的制度设计与动态的制度化建构两个层面，以中国大学“去行政化”的制度需求为基点，提出教授治校型大学学术权力制度的基本制度架构与运行机制设计，同时就学术权力制度化的行动路径提出了“制度建构—制度维持—制度内化”的理论构想。

应当说，按照这样的总体思路和技术线路安排研究内容，至少有以下两个好处：一是主线突出，条理清晰，逻辑统一，各部分内容不仅体现了特定的分析视角与理论工具，而且各自包含较强的自洽性；二是满足了研究视野开阔与研究内容纵深的需要，书中第三章、第四章把基于中外大学发展史的案例研究的制度演进分析涵盖进来，虽然增加了论述难度，却十分符合制度分析的内在连贯性要求，彰显了经典案例的内涵及说服力。

在核心观点方面，我认同作者在书中所提出的一些颇具见地的看法。例如，书中关于中外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化的两个基本研判：一是西方大学

在中世纪大学时代即已基本完成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化建构，确立了学者（教师或学生）治校的制度架构；二是中国大学在民国时期完成了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化建构，在北大、清华等名校确立了教授治校体制，并由此开创了教授治校传统的先河，不过后来因大学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组织生态的变迁，这一传统遂告中辍。在研究结论方面，本书强调当代中国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化过程应以教授治校为制度蓝本和建构方向，相应的制度化实践应从学术权力的制度构建、制度维持与制度内化等层面或环节展开。客观地评价，这一结论的前半部分较具争议，因为目前国内对于教授在大学里的作用究竟应是止于治学领域还是可以扩及治校范畴，意见并不一致。见仁者认为，只提教授治学，难以体现学术主体在大学里应有的主导地位，势必削弱教师群体参与大学决策过程的权利与机会，是抽象肯定、具体虚化学术权力的表现，必然导致大学的行政化趋向；见智者则认为，制度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制度决定历史，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作为社会建制的大学一定脱离不了多元利益主体的价值诉求，因而应强调制度化过程的优化，而不是脱离环境另搞一套。

的确，“学术权力的制度化建构”命题本身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涉及改变大学现存权力利益格局的实践问题，对于青年学者而言，驾驭起来确有不小难度。但作为学术观点，我认为只要是秉持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尊重事实，诚心诚意地进行研究而不是哗众取宠，其结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应享有发表的权利，让其作为一家之言而生存，由实践来检验其真理含量究竟有多少。我衷心祝愿本书的出版能够成为其作者获取同行批评、深化学术研究的新起点，同时也希望它能引起学界对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安排问题的更多思考，以期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进程。毕竟，作为现代大学组织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大学内部权力结构，还是大学治理结构，都绝对离不开一种相对独立存在同时又是组织化、制度化了的学术权力，作为它们自身得以存在并正常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

本书无疑还存在着不少瑕疵，但总体而言，作者在遣题立意、布局谋篇、选择分析材料、运用分析框架、形成基本观点等方面颇费思量并有所创见，达到了一定的学术水准，堪以付梓。这些年来，我感到在不少博士出身的年轻学者身上，急功近利的心态始终难以真正驱除，导致他们一方面想在研究上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又把学术积累过程看得太简单，沉不下

心来，对此我愿与他们分享一点人生体会：学术进取与世俗进取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必然相悖，凝神学术也并非意味着必须绝意事功，但这个过程最好是顺其自然，不要刻意更不要鲁莽为之。在最近十多年的学术追求中，我一直将“观察真实世界，研究有用学问”作为治学态度的座右铭，这也是我对学术人生价值的虔诚理解，今日有缘与昔日弟子重温这一训条，是为序。

龚怡祖

2014年1月8日于南京下马坊

摘 要

在现代社会，大学日渐走近社会的中心，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在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社会服务和文化引领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大学各项社会职能的履行，均须建基于其教育与学术生产力的充分发挥，而后者又仰赖于大学组织中学术本位的制度逻辑。当下，我国大学普遍爆发了严重的行政化问题，大学内外部的行政主导近乎成为事实上的大学制度逻辑，这种行政化乱象不仅严重伤害了大学作为学术机构在规范和文化—认知层面的合法性，而且直接扭曲了大学内部本原的制度逻辑，使大学在教育与学术生产力方面身陷绩效与信任危机而难以自拔。因此，从我国大学的实际状况和制度需求出发，通过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化建构路径提升和彰显大学学术权力，是推进大学“去行政化”变革、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探索教授治学的制度途径，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与核心策略。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化建构，不仅有助于矫正行政化的大学制度结构、重新确立学术本位的制度逻辑，而且有益于大学组织规范合法性与文化—认知合法性的重拾与巩固，以及大学教育与学术生产力的有效提升。

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化建构，既意味着大学内部从权力配置、机构设置到组织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组织变迁，又代表着大学制度逻辑由行政主导向学术本位的根本转变，因而兼有组织变革和制度变迁的双重属性。有鉴于此，对这一研究论题的解析，比较适合于采取组织研究和制度分析融合而生的理论成果——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作为相应的理论借依。依据组织新制度理论，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化建构的目标在于在大学组织中实现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化，使其由现行的“制度构件”状态跃升为完整的“制度设施”，进而通过学术权力制度在大学组织种群中的扩散和在大学组织成员中的内化，实现该制度设施的深度内化和组织沉淀，最终使大学牢固确立学术本位的制度逻辑。为实现这一特定的制度化目标，在学术权

力制度化实践过程中，有必要高度重视大学制度环境的改造和大学对制度环境的能动性作用，充分发挥国家（政府）、教育家与学者等专业人士以及学术文化等制度化促动者的支持作用，沿着基于回报递增的制度化、基于承诺递增的制度和随着日益客观化而增加的制度化等三种制度化基本路径，同步推进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化建构。

作为一种高度制度化的组织，大学通常都是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这表明大学组织既具有源自早期大学世界品格的诸多共性，又具有民族化、地域化变迁后因特殊制度环境所致的独特个性。大学的共性意味着西方大学的学术权力制度化经验值得中国大学借鉴和参考，大学的个性则提示当前中国大学的改革者们还有必要注意民国时期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化的本土案例及其启示。因此，为提供相应的案例支撑、经验参考和制度参照，研究者沿着中外大学史的基本脉络，对西方大学和民国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化的相关案例进行了解析，从制度安排和实践行动两个层面总结了中外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化的经验教训。“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相信这种对历史案例的解剖和挖掘，能够为当下中国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化建构提供某些有益的历史启迪和借鉴。

对西方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化的历史考察表明：现代大学起源于以学者行会形式出现的中世纪欧洲大学。当时的学者行会在理性精神、知性传统和求知欲望的内在驱动下，巧妙利用了中世纪欧洲社会教权和政权两大权力中心相互对峙的分权格局，以特许状等形式赢得了行会自治的一系列特权。在行会自治的制度框架中，后期成为主流的教师型大学内部出现了由全体教师组成社团共同执掌大学治校权的学者治校模式，这就是原初的教授治校制度。随着巴黎大学办学模式在欧洲乃至美洲的传播，教授治校制度亦随之在更广的地域范围内扩散，并最终形成西方大学教授治校的传统。可见，中世纪欧洲大学即已实现了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化，并取得了学者治校的具体制度成果。由于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内在地契合于大学的学术本性，有助于激发大学的教育与学术生产力，因而作为古老的大学传统一直传承下来，为西方现代大学所继承。此后，随着大学自身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西方现代大学之多元利益相关者属性日渐明显，大学治理中的多元共治趋势渐趋走强。但大学的学术本性从未动摇过，教授治校的传统和理念也被传承下来，并作为一种居主流地位的制度结构和组织传统存在于西方主流大学之中。当然，因各国大学制度环境的不同，欧陆大学在教

授治校方面较美国大学表现得更为明显。历史地看，教授治校制度无疑是经典的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形式，它历经千年风雨传承至今，顽强的生命力中所折射出来的价值合法性与制度优越性无可置疑。

与西方先发内生型大学不同的是，中国近代大学是作为政府改革产物的形式出现的，这意味着它并没有类似西方大学那种深厚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传统。民国成立后，得益于其时特殊的外部制度环境和一大批杰出教育家与学者的建设性作用，中国大学迅速实现了现代化、本土化和制度化的变迁。在此过程中，经过始于北大、兴于清华而续于西南联大的艰难过程，民国大学终于完成了学术权力的制度化，确立起类似西方主流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此间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改革和清华教授坚守教授治校传统的经典案例，可谓为当前的大学改革者提供了有关大学学术权力之制度建构、制度维持和制度内化的诸多有益启示。遗憾的是，随着20世纪中期大陆政权的更迭和高等教育发展路向的转换，民国大学教授治校的制度成果被遗弃，本土大学教授治校的宝贵传统随之中辍。新中国成立后，高度集权的大学管理体制和“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的付诸实践严重挤压了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空间。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有所改观。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学再次陷入行政化的泥沼之中。学界的相关调查显示：在行政化的组织背景下，大学学术权力仍屈居于党政权力之下，甚至沦为附庸和点缀；学术人员参与大学学术事务的制度渠道和实际效能相当有限；即便已流于形式的学术权力机构本身都出现了高度行政化的运作趋向。大学学术权力制度的这种运行状况无疑严重制约了学术人员的积极性，进而损及大学的教育与学术生产力。

针对当下中国大学学术权力不彰、尚处于“制度构件”状态的实际，加快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化建构步伐已刻不容缓。依据组织新制度主义的理论主张和中外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化的历史启示，有必要从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构建、学术权力制度的维持与内化层面来推进中国大学教授治校型学术权力的制度化建构。就前者而言，就是要加快大学及其所在场域的“去行政化”变革，充分发挥政府、教育家、学者、高教中介组织和社会运动等制度性行动者的支持作用，科学设计适合中国大学领导体制的教授治校型学术权力的制度架构和运行机制，并从规则、规范、文化—认知、物质资源和组织实践等多重制度要素的系统整合和结构化着手，尽快完成制度构建任务；就后者而论，就是要参考组织新制度主义者所提出的三种

制度化观，积极建构分别基于物质激励、身份认同和观念引导的制度维持策略，利用强制、社会规范和模仿三种制度同形触发机制促进教授治校制度在中国大学组织种群中的扩散，同时依循制度内化的机理思考和落实教授治校制度在大学组织成员中的有效内化策略。

关键词：大学学术权力 组织新制度主义 西方大学 民国大学 制度化 教授治校 制度化建构

感谢广东省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项目及
湛江师范学院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目 录

| | |
|-----------------------------------|-----|
| 第一章 引论 | 1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其研究价值 | 1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的辨析与厘定 | 6 |
|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14 |
| 第四节 分析视角：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 | 30 |
| 第五节 研究设计与框架结构 | 34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38 |
| 第一节 组织新制度主义之理论述要 | 39 |
| 第二节 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化建构的分析框架 | 52 |
| 第三章 西方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化的历史考察 | 63 |
| 第一节 中世纪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化 | 64 |
| 第二节 西方现代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形式 | 83 |
| 第三节 西方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化的当代启示 | 102 |
| 第四章 中国大学学术权力制度的历史变迁 | 118 |
| 第一节 民国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化： 北大、清华到西南联大 | 119 |
| 第二节 新中国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演化： 行政化变迁及纠偏尝试 | 157 |
| 第三节 大学行政化背景下的学术权力 制度运行状况调查与分析 | 171 |

| | |
|--|-----|
| 第五章 中国大学教授治校型学术权力的制度安排及基本要素····· | 197 |
| 第一节 教授治校型学术权力制度：中国大学“去行政化” 的核心制度需求····· | 197 |
| 第二节 教授治校型学术权力的制度架构与运行机制设计····· | 210 |
| 第三节 教授治校型学术权力制度的基本构成要素····· | 220 |
| 第四节 教授治校型学术权力制度的配套制度改革····· | 232 |
| 第六章 中国大学教授治校型学术权力制度化建构的行动路径····· | 241 |
| 第一节 教授治校型大学学术权力制度的构建····· | 242 |
| 第二节 教授治校型大学学术权力制度的维持····· | 255 |
| 第三节 教授治校型大学学术权力制度的扩散····· | 267 |
| 第四节 教授治校型大学学术权力制度的内化····· | 274 |
| 结论····· | 285 |
| 参考文献····· | 290 |
| 后记····· | 304 |

第一章

引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其研究价值

一 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社会，以研究高深学问和培养高端人才为基本宗旨，以对知识的发现、保存、选择、传递及应用为中心活动的大学正日渐成为整个社会场域的“轴心机构”。凭借自身的知识生产功能，大学经由学术活动创造出的新科技和新文化，已成为驱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两只车轮”。在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大学的推动作用已是人所共知；在像中国这样正处于赶超阶段的后发国家里，大学系统的作用更是不可低估。因此，在社会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大学肩负着无可替代的历史重任。能否像西方同行一样通过卓越的教育学术表现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提供持续而强劲的人力资本与知识成果支撑，已成为时代发展对中国大学的无声拷问，当然也是中国大学在改革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大挑战。

重任在肩，中国大学的现实表现又当如何呢？当我们将目光投向被政府和公众寄予厚望的中国大学时，现实的情景常常让人倍感沉重。中国大学系统不仅明显暴露出政治走向、布局失衡、配置欠佳、产出匮乏、功利心态、动力缺损、传统短暂、恶性竞争、量质错位、评估失准等诸多表层问题，^①而且存在着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教师理想、大学独立性、大学制度、大学行政服务、大学教授话语、大学特色、大学学术评论、大

^① 任剑涛：《全球化与中国的大学处境》，《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4期。

学信任等更深层次的“十大缺失”。^① 中国大学何以如此？这个问题不妨从大学内外部的制度因素来解答。从制度层面看，中国的大学体制无疑体现出一种高度的“行政化”特质。“行政化”意味着大学内外部的行政权力过亢，凌驾并挤压着对大学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的大学学术权力，加剧了学术权力的边缘化。而学术权力的边缘化，不仅会进一步诱致大学官僚化的恶性膨胀，而且会导致大学学术本位的严重“漂移”，进而催生一系列的严重后果。比如，大学的学术氛围早已今非昔比，而商业气息和技术至上倾向却日渐突出，大学教育质量出现普遍滑坡，^② 学术大师的诞生和杰出人才的培养仍旧是可望而不可即。^③ 中国大学的困境，是大学理念迷茫、大学精神削弱、大学文化蜕化和大学制度扭曲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毋庸置疑，要改变当下大学学术不彰、绩效不高、口碑不佳的现状，就必须以高度的紧迫感重建本土化的现代大学制度；而要建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就必须从其根基——彰显、复归学术权力做起^④，确立制度化的学术权力，建构规范化的学术权力制度。

事实上，在经由学界的理论探讨，到逐渐引起高校、媒体和公众的注意，直至政府认同并积极介入的各方长期互动之后，学术权力制度的建构问题近期也获得了政治合法性并进入政策流程，相应的官方信号是：由国务院审议通过并正式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明确提出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等制度改革任务。^⑤ 对于《教育规划纲要》所明确提及的制度改革任务，学术权力的制度化建构无疑都是其应有的题中之义和关键的价值诉求：大学办学自主权，乃大学组织作为一个办学实体所需要的、对外寻求教育和学术自主的权力，它实质上是学术权力在大学组织层面的投影；现代大学制度，本质上是旨在维护大学自主、学术自由与学术至上原则，巩固与彰显学术权力的规则体系和社会结构；大学治理结构，则是包括学术权力主体（学

① 刘尧：《中国大学的十大缺失》，《中国电子教育》2006年第3期。

② 王英杰：《大学危机：不容忽视的问题》，《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3期。

③ 钱学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理论参考》2010年第5期。

④ 许杰：《彰显、复归学术权力：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根基》，《高教探索》2011年第1期。

⑤ 龚怡祖：《大学治理结构：建立大学变化中的力量平衡》，《高等教育研究》2010年第12期。